

感、对其他地区文化的不适应。互联网给予了各种方言之间相互碰撞的机遇，让“交际”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但戏谑方言、将方言杂糅到共同语上的网络用语，却不利于共同语的规范使用，需要警惕。

语言文字观

2020 级汉基 1 班胡培怡

本来我对文字反映、记录语言是深信不疑的，可是看到《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六章里写道“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时，我心中却产生了很多疑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对着校道旁的树用英语和汉语简单地想象语言和文字产生的过程，得到的只是零散的、混乱的只言片语。今天坐下来，好好地梳理梳理，希望能获取一些思考的结果。

首先，文字怎么表现语言？索绪尔把文字归类为书写的词，是声音符号的代表。也就是说，文字是用来记录声音的。大可以说，以我中国人“表意文字”的语言习惯和思维认知来看，肯定是无法认同的，但是我认为，从“表音文字”体系来看，这样的定义也是不完善的。人类给了路边的“树”一个“树”的概念和音响形象后，当他们希望用字符把这样创造性的成果固定下来时，说一个音义的结合体只取记录的声音，“tree”只是一个声符，我认为没有抵达文字的真正含义。既然它已经进入了人类的认知框架内，后代人不需要再考虑怎么创造它而只需要安心地使用它、一代代地传承它，那毫无疑问文字本身就是储存着意义的。索绪尔讲道：“‘表音体系’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摹写出来。”为什么不能是记录了一整个词，而词里恰巧包含了声音呢？例如，英语对我来说是一门全新的语言，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如果碰到陌生单词，我能凭借经验或者借助英标将这个词读出来，但我没法从字面上猜出这个词的意思，这确实说明了表音文字的直接特点，但从客观存在上来讲，它本身就表示着某种意思，只是那种意思不为我熟知。此外，作为非母语学习者来说，比起这个单词的发音，我更加关注的是这个单词的意思。

索绪尔态度强烈地认为，“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我们说某个字母应该怎么这么念，那就是把声音的书写形象当作声音本身。”尽管他并未在“文字表义”这种看法上作任何说明，但我仍忍不住担心，我在文中煞有介事地分析了文字表义，赋予了文字重要的意义，是不是就是用来为索绪尔所批判的“文字具有不合理的威望”提供活生生的例子呢？但是

仔细阅读索绪尔举出的其中一个例子：“我们从法语 oiseau ‘鸟’这个词的正字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这里，口说的词（wazo）中没有一个音是用它固有的符号表示的，这可连那语言的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了”，还是能看出索绪尔对文字产生质疑的真正原因在于文字作为语言的产物，并没有尽职尽责地反映语言，反而凌驾于语言之上。于是就引向了另外一个话题：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张朋朋先生给出的答案是：文字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不是表现语言中的语音形式的，而是直接表达人的思想的。人创制文字是为了创造一种与语言功能不同，可以“传于异地，留于异时”的视觉表义符号系统。文字是在直接表义的图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字形的创制，文字系统的建立仅仅是受到了语言的影响，受到了语言中某些表义的语音形式的启发，所以字形在初创时才与部分语音形式具有某种对应关系，而这种对应关系是出于创制文字的需要，正因为如此，文字的字形的创制并不追求与语言中的所有语音形式对应，只是为了满足视觉符号表义的要求。因此，一旦文字系统建立之后，因为它和语言是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对应关系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是持久的。^[1]显然，张朋朋先生并不认同语言和文字之间的来源与结果关系，他认为文字是独立的符号系统，有它自己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而语言学家吕叔湘则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将文字和语言归类为并行的两种表达意义的工具是错误的认识。他曾提醒我们，文字（包括汉字）的本质是代表语言，能读出来，“文字必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意义；一个形体必须同一定的声音有联系，能读出来，才成为文字。如果一个形体能够不通过语音的联系，直接表达意义，那就还是图画，不是文字。”^[2]吕叔湘先生是从语言出发来阐释文字，尤其重视文字所包含的语音形象。我更倾向于吕叔湘先生的观点。当人和外界接触时，如果想要感知和描述世界，他首先调动的应该是和主体最紧密的眼睛、耳朵和嘴巴。用耳朵去听，用眼睛去看在头脑中形成观念，用声音去试图捕捉它。语言就这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而文字作为一种更复杂的、凝聚着更多心思的智力成果，其出现远远晚于语言是合情合理的。但我认为这种时间差无法有力地证明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完全

^[1] 张朋朋. 评索绪尔对语言和文字之间关系的论述[J]. 汉字文化, 1994(04):11-16.

^[2] 吕叔湘. 吕叔湘文集（第五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独立的符号系统、文字是为了直接表达人的思想而单独创立的。相反，当语言在人类社会已经初步有了范式，当语言的所指和能指渐渐地约定俗成，当语言已经支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那如果受到需求驱动，再要以书面形式记录语言时，人们是会另起炉灶，创制一套新的符号系统，还是会在现有语言的基础上实现一次完善，一次进步？文字产生的过程应该和语言是连贯的，从发展的延续性和省时省力的角度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张朋朋先生认为文字是在直接表义的图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思考对象的重点大概是放在了汉字上，尤其是由“六书”造字法之一——象形法造出的汉字。这样的汉字意义特征十分突出，“日”写作“”，“月”写作“”，“山”写作“”。但是在语言的框架之下，我认为一个人看见一样事物，最直接的联想还是它被赋予的声音，这种声音由于具有区别度而且对于人类来说“便携”，被用作了沟通语言和汉字的桥梁。天上的太阳读作“日”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后，需要提及它的时候，就不用再费力地描述它，可以声音代指，创造文字时，这个印象也会是最强烈的。按照我上文的观点，文字都是蕴含着人类内部达成共识的意义的，那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的区别就不在于有没有传达意思，而在于表意文字在成型的时候，书写它的人更希望通过字的面貌来突出字本身的含义。这应该属于是过程，而不是张朋朋先生说的起点。除此之外，我十分赞同吕叔湘先生的分析，如果一个形体能够不通过语音的联系，直接表达意义，那就还是图画，不是文字。文字字形和语音的联系应当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谈到这个话题，我不禁想起了前些年的一个网络热词“duang”，它最早是以语音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被演员成龙用来形容用完某品牌洗发水后头发飘逸的状态，十分迅速地，一经传播开，这样一个词就有了文字形式，网友们“蛮横”地用汉语拼音“duang”将其记录下来。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里，语言才是第一位的驱动力，人们可以自由地发动它，来服务于表达的需要，文字紧随其后，也显示出其重要性。从几千年来的语言习惯看，人们是不能忍受一个词没有与之匹配的文字的。上述例子和张朋朋先生认知中文字的产生过程是向背的，文字“duang”的产生和需要自发地创造它来表示一种音效是无关的。

那文字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语言吗？我认同文字是脱胎于语言的，但索绪尔这个看似过于绝对的讲法值得说道说道。在今天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语言作为交流和传播的重要载体，它的形态被人类的行为深刻影响着。它不总是

沿着传统的、固定的模式发展，时时会出现新情况，产生新问题。近期，有两种网络用语非常流行，一种是“谐音”，用同音或近音字来代替本字，如“很难不支持”写成“河南拔智齿”、“绷不住了”写成“蚌埠住了”、“确实”写成“雀食”，还有一种是“缩写”，提取出拼音音节的首个字母，如“gkd”（搞快点）、dbq（对不起）、uls1（有一说一）。按照这些用语的实际效用来说，它们最终都指向了表现语言，这个角度印证了索绪尔的说法，但特殊之处在于，这些网络用语出现之前，它们要表达的意思已经有专属的、一对一的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了，走的是正常流程，并且已经十分稳定。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文字的创新，在结果之外而非过程之内，确实能够给日常交流增加一些陌生感和新鲜感。也就是说，在不影响表义的前提下，文字是可以拥有一些其它的存在意义的。但是，存在意义不等于存在理由，这个不能作为有力的反例来辩驳索绪尔的观点，虽然也让我在一开始兴高采烈地以为找到了新的语言现象，可以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宏观的历史上来看，文字被需要的原因就是用来表示语言。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各种艰难晦涩的术语和列举看得我要么云里雾里，要么没有太多触动，但是他关于语言和文字的论述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兴趣。这篇读书报告虽然不够深入，也许还有很多我意识不到的逻辑漏洞，但也算是给环绕很多天的问题一个小小的答案吧。

评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地理差异性的观点

2020 级汉基 1 班郑杰

语言的地理差异性：

索绪尔认为地理语言学是外部语言学，因为这是涉及语言现象和空间的关系，地理语言学是外部语言学，无法停留在语言内部进行讨论。语言的地理差异是人们发现最早的语言差异，不同于隐性的时间差异，人们只要比较两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就能显而易见地得到答案。因此原始的人也认为语言就是后天形成的一种习惯，也就是民族性；而非像肤色一样与生俱来的种族属性。同时人们也认为自己的语言是高人一等的，别的民族的语言不能被称之为语言，这种观念可能也延伸到民族歧视的层面，比如古代中国的中原人就认为不说汉语、茹毛饮血的是蛮夷。

索绪尔认为人们面对不同语言时，往往会本能地进行比较，并探索其相似性。但同时往往相似性很难得出语言学的结论，人们更愿意研究语言的差异性。直到近代语言学，人们才提出语系的概念，用来描述几种具有亲属关系，即共同来源的语言。语系与语系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尽管人们一直在寻求语系之间的共性，但这些研究总会遇到无法跨越的障碍。那所谓的共性仅仅存在可能之中，目前尚无法证明。索绪尔说：“世界上一切语言都有普遍的亲属关系是不大可能的，就算真是这样——如意大利语言学家特龙贝提所相信的——由于其中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也无法证明。”

不仅语系之间存在差异，语系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分歧。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有大有小，有些惊人地相似，如禅德语和梵语；有些却显得完全不相似，如梵语和爱尔兰语。索绪尔认为，“只在很轻微的程度上有分歧的语言称为方言”方言与语言之间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性质的差别。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一理论在一些汉语方言中不适用。他们认为汉语中的一些方言，其分歧程度比有些不同国家之间语言的分歧程度更大，而至于“分歧”的形式、范围及程度，也不可一概而论。比如，语法是语言中较稳定的要素，语法上的同异应重点考察；词根与底层残留词汇在词汇系统中是较稳定的，而常用词汇则较易受到语言接触的影响，在比较词汇的同异时应有所侧重，等等。

语言地理差异的复杂性：

多数时候，一个国家的语言是不统一的，由于一些原因形成的语言的地理差异性具有复杂性。索绪尔认为理想状态下的语言地理差异是有多少个地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但是事实往往没有那么理想，两种语言可能相互渗透，可能在地域上划分的很清楚，甚至也可能存在在同一地方而不相混。他以爱尔兰、芬兰和巴斯克地区为例进行了论证。他指出，“但这种分布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这无疑是正确的。在某一些国家之中，语言的混杂现象更加厉害，比如马其顿就混杂了五到六种语言，单一语言的国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这种语言的重叠就导致了语言地理差异的复杂性，而这种重叠往往是由于新来居民的语言会凌驾于土著

居民的语言之上;有时又会由于与邻近地区的交往而产生语言接触,从而产生语言兼用和语言转用。

除了上面的原因,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自然语言的统一性。索绪尔这里所说的文学的语言代表不仅是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是广义上指各种为了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语言。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雅言和中国现代的普通话。任由它自由发展,语言只会成为一些互不侵犯的方言,结果导致无限的分裂。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的交际日益频繁,他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成为与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物的传达工具,这种语言可以不需要文字。这种语言和方言并存于一个地方,譬如说广东的孩子会同时讲粤语和普通话,这也是语言地理差异复杂性的一个表现。那么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是什么?我在这里以汉语为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汉民族有不同的共同语,共同语确定后,又与方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索绪尔曾提出语言学研究方法有历时和共时的区别。从历时的层面看,方言和共同语是亲属语言,有着共同的来源,在语音、词汇、语法上虽有差异,但也有很多相似性。从共时层面看,共同语和方言互相影响,普通话不断向方言渗透,对方言的词汇、语法、语音、产生影响。方言区人们学习普通话时,也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方言普通话现象,比如广普,川普等。方言的词汇、语音、语法也在不停地影响着普通话。在这种相互作用中,普通话对方言起着规范的作用,而方言也对普通话起到了丰富的作用。

形成语言地理差异的原因:

形成语言地理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索绪尔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时间。首先他做了一个假设:假设有一种语言原来流行于一个小岛,后来被殖民者带到另一个小岛,试问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对于原来的语言 (A) 和被移植的语言 (B) 来说,语言的创新在 A 或 B 上可能都有发生,或者双方同时发生。那么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将会发现,第一故乡和第二故乡的语言之间会在词汇、语法和发音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别。索绪尔认为这种差异是时间所造成的,我们不可能设想只有那些被移植的语言才会发生变化,事实上留在原地的语言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因此语言的地理差异应称为时间差异。

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只是产生地域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内部原因,而外部的社会原因是索绪尔未能考虑到的。比如说中国现代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影响。政治决定了普通话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权威语言,推广普通话利于国家稳定发展,方言的生存空间因此会被挤压。经济的发展需要统一的语言便于交流,方言也随时代发展逐渐退场。但是文化多样性又要求方言的登台并大放异彩,以此满足观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这些外部原因对语言地理差异有很大影响,不可简单的把语言地理差异称为时间差异。

关于语言波浪的传播: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传播收到两股相反方向力量的支配。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精神,即“乡土根性”;另一方面则是促使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乡土根性”就是一种保守性,它促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传统。这种根性是在一个人的童年养成,经过岁月的熏陶十分的顽强,所谓“乡音难改”。“乡土根性”促使人们深居简出,而生

活必要的交流又迫使人们运用语言传播的交际功能。

索绪尔认为“乡土根性”在语言传播中往往起到消极作用，因为在一个较大范围内两种力量是相互起作用的，尽管他们的比例不同。他用日耳曼语的例子说明了乡土根性只会形成对立，阻碍语言传播。因此研究某一篇地区发生的语言演化可以完全不考虑乡土根性的作用。统一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就能是整个区域统一起来，而乡土根性不过是每一个地区所固有的交际力量。而他对交际功能的论述比较全面，他认为乡土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需要依靠交际，交际功能起作用的方式分消极和积极两种。每当创新在某地出现的时候，它立即加以扑灭，防止语言分裂为方言。有时是积极的，它接受和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而他所谓语言波浪的传播的观点就于此形成，等语线带来的语言创新波浪，他用波浪这个词来表示语言的地理界限，等语特征线就像是洪水涨退的边缘。

但索绪尔把两股力量对立起来看待，这样难免是不够全面的。乡土根性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当人在异乡时，总有一种要向同在异乡的同乡人靠近的愿望，。比如，美国的“唐人街”，当说汉语的人聚集在一起，汉语就将在这个地区传播开来；同时语言内部也可能在社会生活中产生新的演变，词义会发生扩大、缩小或者转移。因此乡土根性对语言传播也并非一无是处的力量，它与交际功能应该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

以上是我对索绪尔关于地理语言学观点的看法和评价，我们应该辩证地学习索绪尔的理论，尽量多角度、多方面思考，重视实地考察，科学论证，并把它正确地运用于实践之中。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 班李嘉姿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四编围绕地理语言学展开。主要内容有：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地理差异的原因和语言波浪的传播。

首先，索绪尔在此编第一章开头点明，语言研究中，语言的差异是最令人瞩目的，且在这其中，空间差异远比时间差异来的明显。这其实不难理解。我们都知道，语言在日常的使用中是会不断进化改变的。对于特定的区域来说，譬如民族、地区，它的使用在总体上是趋向统一的；而对于语言其本身的演进历程来说，它会不断产生新的内容，融入新的元素，由此而产生分歧的。而基于各个地区原始语言的不同，受地区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其发展和演进大多只会越来越具有当地特色，区分度逐渐提高，因此时至今日，国家与国家之间使用的语言大相径庭，甚至是城市与城市、村落与村落之间，使用的语言都可能有非常大的语音差异。反观语言的演进，它虽然是不曾停止的，但变化却较为和缓。以普通话为例，在如今互联网时代，语言在日常生活里的频繁使用中会不断形成新的词语，人们对新产生的网络用语早都习以为常，比如：“蓝瘦香菇”、“社恐人”等等，它们都在不断改造语言。可即便如此，今天人们说的普通话和昨天说的并无太大差异，甚至几年、十几年间，在当时流传的用语放在现如今也能使用，它的语法和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因而其时间差异体现相较于空间差异是不那么明显的。

而在第二章中，索绪尔就“地理差异的复杂性”这一主题展开叙述。第一节阐述的是几种语言在同一地点并存的情况。他指出，语言差异的最一般因素是地理上的分隔，而后谈及的问题即是“两种语言在同一地方并存而不相混”。而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便是指新来的外来语言有时会凌驾于当地土著语言之上。于是便引出了“语言的入侵”这一现象，且此现象并非近代所特有。就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从 14 世纪地理大发现的航海时代开始，商业贸易、版图探索和殖民侵略，都使得不同民族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往来变得密切，这势必就伴随有不同语言的交互。而入侵语言作为殖民侵略民族的象征，其自身带有一定的侵略与征服意味，因而当入侵语言的种子被播种在殖民地语言土壤后，便会会对当地土著语言产生强大的冲击力。语言的侵略是文化侵略的一种表现，而殖民者为达到统治与征服的目的，常常会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即在文化侵略的同时伴随武力压制和政治入侵，通过暴力征服迫使当地土著学习并使用入侵者的语言，从而达到语言控制。被侵略地区的多方面在同一时间受到摧残，因此其语言也容易臣服于外来语言，即是索绪尔所提及的“外来语言凌驾于土著语言之上”的情况。但不同地区的语言一经形成并使用，即说明它已经拥有了相对完备的语法系统和使用规则，即使在一段时间内未能被人们频繁使用，如被侵略时受到教育压制因为无法流行，可其已经被产生创造并有效通行，因而除非受到非常重大的破坏或使用群体的灭绝，否则语言生命力之顽强都会对它进行有效的保护。这或许可以被称为语言的韧性。正如被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虽然英语已经被推广普及且称为第一使用语言，但印度本土语言仍在被使用，且两者并没有因为共存在印度社会而相互全面融合，两者仍拥有本质上的区分。而就近现代的语言环境来看，民族群居杂处，但他们的语言并不相混。这一点浅显易懂。因而说，不同的语言在同一地区内并存重叠，原因可能是民族入侵、和平渗透或是游牧民族的作用。

第二节的主要内容是文学语言和地方话。在这一节中，索绪尔提出，“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且指出这一现象是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到一定程

度后才会出现。那些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正式或非正式语言在自由状态下发展的话，就会形成互不侵犯的方言，且导致无限分裂。但这种情况放置在人们的社交生活中之后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在交际日益频繁下，人们会约定俗成选出其中现成的某一种方言，使其为整个民族的沟通和语言发展服务。这便揭示了不同的民族或者说是不同的地区的地方语言的形成原因。而在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全民语言和地方语言共存，且能够达到相互平衡和相互促进。举个例子来说，在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方言，而现在在中国境内普及面最广、最为通用的语言便是普通话。各个民族的方言由其历朝历代的发展筛选决定，是其民族的象征，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而普通话的推广使用也是由整个中华民族的使用和发展的需求决定的，其中也带有政治的因素。但由文学语言和地方话的关系之中我们也不难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尽管全民语言和地方语言能够达到共存，但在未来的使用之中，是否有可能因为全民语言的影响力过大而导致地方话遭到侵蚀。这是语言发展过程中一个值得重视和思考的问题。正如现代的中国社会，普通话的推广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它的流行同时也意味着对传统地方语言的强烈冲击，很多人可能由于从小受到的教育影响，已经无法使用甚至是无法辨别自己民族和家乡的方言，这导致了地方语言失去了大量的使用群体，许多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发展数千年的地方语言面临生存危机。如何平衡全民语言和地方语言，使地方语言仍保留象征意义和语言使用价值，不至变成濒危语言种，这也是人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第三章中，索绪尔开始分析语言中地理差异的原因。首先第一节谈到的便是时间。而在此小节，他提到，人们认为空间对语言造成了差异这个想法其实是受到欺骗的，他认为空间对语言并不产生什么作用，真正对语言发展分化的出现造成影响的是时间因素，地理因素只是影响它的次要方面。当然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不考虑“语言的不稳定性”。在第二节中，索绪尔设想了一种模式，即某一国家使用单一语言。当然，根据我们基于对事实语言发展的了解，我们能够推断这个地区的单一语言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如地理环境，人文差异，社交需求等都有所不同，且合理推断这些不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对语言产生干预，这些干预具有地理差异性、民族性和持续性等多个特点，由此，这一个独立国家使用的单一语言也会不断分化，从而又生出各种各样的地方语言来。在第三节中，索绪尔指出“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这一结论的首要前提是不应该定义方言为某种完全确定的语言类型。或许在索绪尔看来，方言可以被理解为放任语言自由发展分化的产物，因而方言是一种语言概念，此概念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指向的语言内容能够持续且相对自由的变化，因此它会产生许许多多不同的结果。伴随着方言的扩展，对其的研究也变得复杂起来。确定其扩展区域，深入的研究也就需要用其新的概念取代旧的概念，即他所指的“没有自然的方言，只有自然的方言特征”这一理论。

第四章中，索绪尔阐述了“语言波浪的传播”这一点。他在第一章的论述和我们日常对于语言传播的理解有高度的重合，即语言的传播是有遵循一定的规律的。而第一节里提到的规律就是“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交际使得语言得以传播推广并与其它语言产生碰撞融合，而“乡土根性”则使得一个语言体忠诚于自己的使用与发展传统。这两者就是语言发展的“放”与“收”，索绪尔称之为“语言的扩张与内聚”。事实上，任何语言的发展确实都离不开这两者的共同作用。语言的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既有开拓创新，又有坚守的传统，人们使用旧有的语言，又创造新型语言，使得语言发展内容丰富而有具有传统的特征。扩张与内收相互牵制，形成平衡，从而使语言的产生和使用达到理想状态。

索绪尔在这一编里围绕着“地理”和“语言”的关系展开了深层的叙述，从“是什么”和“为什么”方面解读，使得我们对于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自身的内部建设规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